

流氓无产阶级与三维历史构图： 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阶级叙事

熊市伟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流氓无产阶级”是马克思关于波拿巴政变的阶级叙事中最为独特的一个群体名称。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切入点, 梳理它与历史的关联, 为完整、恰当把握马克思的阶级叙事提供了契机。从直接维度来看, 流氓无产阶级本身是社会结构之外的人群, 因而属于历史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既暴露了将阶级视为社会分类标准这一做法的局限, 又要求进一步探究使这一群体得以发挥作用的历史条件。流氓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登上历史舞台, 主要是因为它占据着法国阶级关系与形势中的特定位置。在这个意义上, 它本身的偶然性以非还原的方式表现着关系与形势的特定必然性。这表明, 人群与阶级之间并不存在着先天、固定的简单对应关系。同时, 流氓无产阶级的活动也暴露出关系与形势本身的悖论性, 从而使特定的必然性被纳入到新的实践或伦理关系中。流氓无产阶级以这样的方式反衬历史的可完善性。在这里, 马克思的阶级叙事突破了对既成阶级事实的纯粹解释, 尤其是无产阶级应当被理解为在实践中不断与现存阶级关系相决裂从而逐渐生成的存在。由此, 流氓无产阶级实际上展现出偶然性、必然性、可完善性环环相扣的历史构图, 这种三维构图形成马克思对波拿巴政变进行阶级叙事的核心思路。

[关键词]流氓无产阶级 历史偶然性 历史必然性 历史可完善性 马克思 阶级叙事

[中图分类号]A2; 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 (2026) 01-0017-11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 流氓无产阶级 (Lumpenproletariat) 是一个多次出现、与文本主题紧密相关且需要得到进一步阐释的概念。关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流氓无产阶级概念, 当前学界已认识到它的含混性。例如, 马克·考林 (Mark Cowling) 认为, 它是一个既不清晰也不连贯的概念。^[1](P228-233) 在把握含混性的基础上, 绝大多数学者都试图梳理这一概念相对统一性。其思路主要包括两条。一是参照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社会结构。在这条思路

上, 大部分学者强调流氓无产阶级与社会生产体系的脱节。例如, 哈尔·德雷柏 (Hal Draper) 认为, 流氓无产阶级是从整个社会结构中被淘汰出来的群体。^[2](P469-478) 但也有少数学者如克莱德·巴罗 (Clyde W. Barrow) 指出, 流氓无产阶级的实际构成始终受到资本主义生产与发展的调节。^[3](P30-50) 二是参照无产阶级革命与历史变革。在这条思路上, 大多数侧重于区分流氓无产阶级与革命无产阶级。例如, 夏莹、邢冰区分了流氓无产阶级与革命性或主体性位置;^[4]又

收稿日期: 2025-06-10; 修回日期: 2025-11-25

作者简介: 熊市伟,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如,尼古拉斯·索伯恩(Nicholas Thoburn)从实践模式的角度指出,流氓无产阶级是一个追求历史同一而非差异或变革的群体。^[5]但也有学者如彼得·海斯(Peter Hayes)从历史变革的角度分析了不同形式的流氓无产阶级。^[6]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流氓无产阶级的相对统一性或特殊性。然而,这种相对统一性本身却没有得到充足阐释。马克思的视野并不局限在某个群体上,他更加注重从社会历史的整体去考察流氓无产阶级活动。因此,本文跳出流氓无产阶级本身的范围,转而以流氓无产阶级对历史的关系为视角进行探究。

1848年2月,法国爆发二月革命,奥尔良王朝覆灭;12月,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新成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1851年12月,他解散国民议会、实行军事独裁,向次年复辟称帝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马克思在第一时间里创作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波拿巴政变展开了精彩的阶级叙事。如果说在个人层次上,主角是波拿巴;那么在群体层次上,主角则是流氓无产阶级。正如任何其他群体一样,这个群体不是直接作为历史主体或实体而存在。相反,这一角色只能从其身处的社会历史中得到理解。本文将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方式阐释流氓无产阶级如何层层内嵌于复杂、动态的历史之中,进而立体地呈现马克思的阶级叙事。

一、流氓无产阶级属于历史的偶然性

马克思反对从“个人主动性”^{[7](P466)}的角度去解释波拿巴政变。正如恩格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3版序言中所言,“一切历史上的斗争……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7](P469)}。在资本主义及其之前的历史中,个人始终隶属于特定的阶级,阶级规定着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波拿巴政变只有在阶级分析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在直接意义上,波拿巴代表着流氓无产阶

级。关于波拿巴的阶级归属问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三种可能的选项,即大资产阶级、小农阶级、流氓无产阶级。但如果在这些选项中进行取舍,那么波拿巴只能被归结为流氓无产阶级。首先,波拿巴不属于大资产阶级。法国大资产阶级主要包括大土地所有者、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等群体,其政治代表为秩序党。从政治角度来看,波拿巴与秩序党的合作只是为了应对其他阶级的威胁。一旦这种威胁消失,双方的分歧便重新表现出来。在大资产阶级击败其他阶级后,波拿巴又通过击败秩序党而成功掌握政治大权。其次,波拿巴也不属于小农阶级。关于波拿巴在小农阶级中的群众基础,马克思说道:“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8](P229)},波拿巴只是凭借着法国小农对拿破仑家族的崇拜骗取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在波拿巴上台后,这些农民仍然不仅要接受资本的盘剥,而且还要承担供养庞大国家机器的繁重赋税。由此,波拿巴所直接代表的只能是流氓无产阶级。“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8](P185)}波拿巴牢牢地依靠这一群体,创造了流氓无产阶级的秘密组织即十二月十日会,并使用卑鄙无耻的手段争权夺利、阴谋复辟。在这个直接意义上,波拿巴是作为流氓无产阶级而展开政治活动,他个人独揽大权实际上等于流氓无产阶级实现对全社会的统治。这样,在群体层次上,这一历史过程的主角就是流氓无产阶级。

然而,流氓无产阶级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从形式上来看,某个群体要成为阶级,至少必须符合正反两方面的要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

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些个人只是作为一般化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9](P573)}。要形成阶级共同体，从肯定的方面来看，这个群体必须具备共同的生存条件与利益；从否定的方面来看，它必须在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中明确地同其他阶级相区别。让我们暂且把同时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与此不同，流氓无产阶级仅仅符合否定的要求。关于这个群体，马克思写道：“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化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8](P185)}

从这些描述来看，流氓无产阶级涉及的行业、身份、活动广泛多样且灵活多变，是一个极为不固定的群体。这种不固定性不同于某个“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内部所包含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在后者那里，差异和变化仅仅是个人层次或小范围的，并且始终受到阶级层次的共同条件的规定和调节。相反，流氓无产阶级的不固定性恰恰是群体层次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固定性，这些个人才构成流氓无产阶级。在这里，不固定性将流氓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区别开来，从而在否定的意义上形成了这个群体的核心规定性。通过使用流氓无产阶级这个概念，马克思暂且把那些不能被“严格”归为任何阶级的人群归为一类。

进一步说，与“严格意义上的阶级”相比，流氓无产阶级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完全的不固定性将流氓无产阶级同“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区别开。但是这种区别同“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之间的区别有着本质的不同。“严格意义上的阶

级”兼有肯定与否定的规定性，这使它的否定方面无法做到纯粹和完全。这些阶级之间的区别只能在同一个背景即现存的生产关系之内得到确认。相反，流氓无产阶级与这些阶级的区别恰恰只能通过流氓无产阶级与现存的生产关系的特定距离来定位。正如德雷柏所言，流氓无产阶级不是同某个阶级，而是同整个社会结构区别开。^{[12](P476-478)}马克思把这个群体称为“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8](P185)}。流氓无产阶级不直接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中占据特定的位置。这使得流氓无产阶级在思想、情感和行动上可以不像各个阶级一样受到自身阶级条件的约束，从而在历史中表现出一种不能被简单还原的偶然性或不确定性。这种偶然性在经济活动中体现为，流氓无产阶级是非生产性的。它的经济活动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过程中没有发挥任何关键性的作用，因而在法国资本主义体系中是多余或次要的。这些人与现存的生产关系保持着最弱的关联，“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8](P185)}。

流氓无产阶级的偶然性还体现在政治活动中。首先，它缺少特定的政治诉求。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需要用过去时代的意识形态来掩盖当下行动的真实内容，因而“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那么当流氓无产阶级借用意识形态时，“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8](P133)}。正是由于流氓无产阶级缺乏集体的利益和诉求，在他们的意识形态活动背后根本不存在任何实际的政治建树。对他们而言，政治活动仅仅是服务于个人利益的手段和工具。他们可以在各种政治派别之间摇摆和钻营。其次，流氓无产阶级在道德上拥有极大的自由度。与资产阶级相比，流氓无产阶级不需要用普遍的道德规范来维护自身的集体利益，因而不需要遵守“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8](P186)}。马克思毫不隐讳地表现出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嘲讽和厌恶。这

“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藉的、贪婪的浪荡者”^{[8](P239)}，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8](P237)}，并且他们“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

争”^{[8](P194)}。以波拿巴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为了谋求私利、实行复辟,使用各种庸俗拙劣、阴险狡诈的手段,干出一系列荒唐滑稽的事情。这些特性使他们能够呈现出各种完全不同的面孔,造成令人难以预料的结果,从而在波拿巴政变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过,这种偶然性没有真正起到解释历史的作用。流氓无产阶级的偶然性似乎印证了当前学界从相对统一性与特殊性的角度理解流氓无产阶级的思路。但如果将偶然性仅仅视为流氓无产阶级的相对统一性,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在“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之外又确立了新的实体,从而将偶然性当做解释波拿巴政变的现成答案。在这种用流氓无产阶级的特性解释波拿巴政变的模式中,历史被还原为某种简单的要素,即某个占人口少数的边缘人群的道德或自主行为。于是,偌大的法兰西民族不过是遭遇了一场应当避免并且通过消灭这群阴谋分子就能立刻避免的意外。在这种诉诸抽象偶然性的解释模式中,“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9](P545)},因而这实际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模式。通过这种模式,流氓无产阶级就变成了某些学者所谓的以特定感受方式针对社会某些特定因素的标签^[10]。我们无法借助这种标签来理解,流氓无产阶级为什么能够造成如此重大的事变。更为严重的是,在实践态度上,我们除了谴责少数人之外,就不需要反思和解决其他更为严重、更为根本的问题。由此可见,如果偶然性只是确立了流氓无产阶级的相对统一性,从而能够解释波拿巴政变,那么这恰恰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

实际上,流氓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历史偶然性发挥着设置历史悬念的作用。将波拿巴归结为流氓无产阶级,意味着“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已经无法直接解释波拿巴政变行为。“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强调生产关系对阶级关系的规定;正是通过生产关系,阶级之间的边界得到明确划分。在这种情况下,阶级互动只能从根本上从属于阶级划分,作为阶级划分的

一个次要环节而展开。如果说这里已经暗含着某种从实体的角度去思考阶级的方式,因而容易滑向经济决定论的话,那么流氓无产阶级的偶然性则潜在地拒斥了这种风险。它要求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阶级和历史。不过,偶然性在这里还仅仅起到批判和否定的作用,它自身并不直接是这种新的方式。在马克思叙述波拿巴政变的过程中,流氓无产阶级概念没有真正起到解释性作用,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困惑。通过这样一个悬设,一种令人不解的现象呈现出来:一个不在社会占据任何特定位置的边缘人群竟然戏剧性地实现了对全社会的统治。这个由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引发的困惑当然无法由这个概念本身来解答,我们需要寻找更为根本的答案。这样,借助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历史的偶然性作为一个亟待解释的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里,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已经超出学者们在建构其相对统一性时的问题域。

因此,马克思提出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只是为了更好地提出问题。流氓无产阶级当然在波拿巴政变中发挥着主动性作用,但这种作用与最终的胜利并不匹配,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必然关系。马克思所要探寻的恰恰是那些使偶然性得以发挥作用的必然性要素。流氓无产阶级本身只是人群,它的作用和结果都取决于社会关系的结构和位置。正是这种结构和位置的支撑或默许,才使得流氓无产阶级能够在历史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通过把握这种结构和位置的必然性,我们能够化解偶然性所产生的悬念。

二、流氓无产阶级表现历史的必然性

不同的阶级或派别之间的分歧与斗争塑造着法国社会特定的历史形势。这种形势一方面限定着流氓无产阶级的活动范围与方式,另一方面也因此为流氓无产阶级的活动提供了可能的位置或空间。正是由于偶然地占据了形

势中特定的位置，并因此顺应了法国阶级斗争形势的特定必然性，以波拿巴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才成功实现政变。换言之，波拿巴政变不过是“先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8](P217)}。因此，流氓无产阶级的成功表现了形势的必然性。

这种必然性不能被还原为某种抽象的、简单的本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呈现的阶级关系与形势是由多方面相互异质的因素共同复合而成的整体。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在各有关领域中活动的‘不同矛盾’……虽然‘汇合’成为一个真实的统一体，但并不作为一个简单矛盾的内在统一体中的简单现象而‘消失’。”^{[11](P88)}这些相互异质的因素实际上构成关系性的整体。这种关系性整体无法被简单地还原为其中的关系项或“关系的纽结”^{[12](P44)}；相反，任何关系项都只能在它同其他关系项的关系中得到理解。关系项以关系整体为根本前提，前者以一种关系主义的方式表现着后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流氓无产阶级表现了阶级关系与形势的必然性。具体而言，以波拿巴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政变活动从以下四个逐步递进的层次表现出法国社会特定的必然性。

首先，流氓无产阶级表现了阶级妥协与社会整合的必然性。流氓无产阶级从法国社会的边缘人群一跃而成为统治者，首先是因为任何一个主要的阶级都已经无法从其他阶级那里取得普遍的支持。1848年二月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法国社会的根基，各阶级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反而因此表现得更加明显和严重。在波拿巴政变之前，主导性的政治角色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它逐一击败其他阶级或派别，大资产阶级与它的敌对阵营之间不断走向分裂。这导致大资产阶级无法凭借着社会集体的名义进行统治。“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8](P177)}。正如德雷柏指出，在这种任何一个阶级都无法实现社会整合的阶级均势下，只能由它们之外的力量来充当中介。^{[13](P403-409)}这种中间角色至少能够暂时地取得各方的同

意，从而凭借着社会的名义进行调节与整合。以波拿巴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正是由于占据了这个位置，才能够取得对全社会的统治。在这里，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反映出阶级分歧背后更为根本的相互依赖关系。任何一个阶级都不是独立自存的实体，它的阶级利益必须得到其他阶级的有效认同。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从根本上规定着各个阶级的利益与分歧。之所以阶级之间会出现分歧与斗争，恰恰是因为它们都试图使对方认同自身的利益。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即使无法直接由主要的阶级自身来实现，也必定由它们之外的其他群体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实际上使得法国不同阶级和派别的利益诉求得到相对稳定的安排和配置，从而完成了二月革命未解决、大资产阶级未完成的社会整合任务。由此可见，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表明，阶级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一种根本和必然的关系。

其次，流氓无产阶级表现了阶级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性。在《共产党宣言》中，流氓无产阶级被描述为“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7](P42)}的工具。在后来一些学者的阐述中，这种工具性力量被当做流氓无产阶级本身所固有的东西。^{[3](P70-85)}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却展示了这种力量背后更为根本的阶级互动关系。波拿巴所代表的流氓无产阶级由弱小到强大，得到了诸阶级的助推。二月革命结束后，法国社会存在着一种行之有效的“效仿”与“重复”。当无产阶级试图建立社会共和国时，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其他阶级联合起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同样的一幕以戏剧化的方式反复出现在法国政治舞台上。正如资产阶级共和派使用武力和戒严来对付广大群众一样，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即秩序党也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来击败共和派；正如秩序党通过攻击议会和立法权来对付共和派一样，波拿巴集团也通过摧毁立法权来击败秩序党。“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么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

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说：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等的制度，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8](P148)}？连续的阶级斗争不断地诉诸更加保守、落后乃至反动的势力，也就是在不断地默许、助推、壮大这种势力。最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斗争的手段制服了社会本身。这样，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实际上否定了任何单方面阶级行动的可能性。阶级行动从根本上是双向和互动的。阶级斗争中的任何一方不仅无法摆脱对方的作用和影响，而且无法摆脱自身行动的反作用。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一个行动既是针对自己也是针对对方”，“既是某一方的行动同时也是对方的行动”。^{[14](P119)}这种相互作用往往通过间接的方式实现，以出乎当事人意料的面貌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表现了阶级斗争的相互性。

第三，流氓无产阶级表现了阶级活动从既定政治传统出发的必然性。阶级互动不得不“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8](P132)}展开。19世纪上半叶法国独特的历史传统框定了二月革命后法国阶级互动的背景与内容。正如学者指出，与在17、18世纪逐步完成资本主义变革的英国不同，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比较迟缓。^{[15](P41-44, 244-245)}资本主义的相对不发达造成市民社会的相对不发达，而这又是同强大的行政权力相适应的。在法国，“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8](P172)}。与市民社会不同，国家主要通过人们对官僚、军队、警察、监狱等因素的崇拜和畏惧进行统治。在这种状态下，社会各阶级的利益诉求能够同至少表面上中立的行政权力相适应。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特点使得共和主义不具有社会的基础，因此在二月革命后，法国社会仍然需要回到“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8](P135)}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深刻地反映了法国社会的这种政治传统。它表明，与改造世界的革

命行动不同，通常的阶级斗争不仅直接遭到既定的政治传统，而且不得不适应和接受它。各个阶级只能在这种传统之中定位和实现自身的阶级利益。它们无需、也不想、更无法从根本上改造这种传统本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8](P135)}在这里，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8](P227)}。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恰恰使既定政治传统对阶级斗争的规定性暴露出来。

最后，流氓无产阶级表现了阶级斗争依赖特定意识形态的必然性。在政治活动中，“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是“亡灵”的“名字”“口号”“服装”“语言”等。^{[8](P132)}流氓无产阶级能够在法国既定的政治传统中占据特定的位置，还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存在着一个特定且包含某种普遍性的“结合”。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是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由于拿破仑曾经捍卫占法国人口多数的小农阶级的切身利益，行政权支配市民社会的传统便同“拿破仑”这个符号结合起来，逐渐形成马克思所说的“拿破仑观念”。这个结合在波拿巴本人的积极作用下得到发展，^{[16](P163-176)}同时又在小农阶级对二月革命的失望中被强化。正是由于这一结合，波拿巴集团才能获得决定性的支持。更为根本的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活动还暴露出“结合”所包含的某种普遍性。正如学者指出，对于政治活动而言，意识形态不是纯粹工具意义上的，而是内在构成性的。^{[17](P129-142)}波拿巴集团的行动中就只存在着对过去的单纯借用和模仿，“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8](P133)}。流氓无产阶级根本无法将意识形态仅仅当做工具来使用，它自身反倒成为由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存在。这种情况不应当被视为个别或局部的，不仅是因为起主要作用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且是因为起领导作用的阶级沉浸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中。它的阶级利益恰恰在这

种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妥善安排和配置。唯有如此，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才能真正地产生“英雄行为”、具有“英雄气概”，才能真正地“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8](P133)}只是在革命完成后，我们才说这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狭隘内容”的“自我欺骗”^{[8](P133)}；也就是说，只是在事后，意识形态才可能被贬低为虚假意识或工具。由此，正如阿尔都塞所言，马克思用“基础”和“上层建筑”^{[8](P159)}来表述社会结构，“实际上是隐喻性的，即它仍然是描述性的”，我们需要思考“它以这种描述的方式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18](P329)}如果说在第一节中，流氓无产阶级对过去的单纯借用和模仿只是潜在地拒斥了经济决定论，那么在这里，这种借用和模仿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把握意识形态现实性的契机。

综上所述，流氓无产阶级所表现的必然性包含着多个逐步递进的层次。首先，在特定的阶级关系与形势内，阶级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只能在更为根本的相互依赖与中介关系中来定位。阶级斗争不是要彻底消灭对方，而是为了从对方那里实现自身的阶级利益。其次，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规定着阶级斗争的目的和结果，而且规定着阶级斗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存在单方面或单方向的阶级行动，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会往往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对自身产生反作用。第三，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具有形式的规定，而且具有内容的规定。特定时代的政治传统直接规定着阶级共识与分歧的内容，从而构成了斗争双方无法逾越的界限。最后，正是在取材于过去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各自狭隘利益的阶级斗争才获得了普遍的意义。在这里，意识形态既不虚假，也非从属之存在。阶级斗争由此成为真实的斗争。正是由于法国社会阶级关系与形势的必然性是这样一种复杂关系整体，而不是单纯、同质或排他的实体，具有偶然性的流氓无产阶级活动才有可能融入这种必然性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偶然性的流氓无产阶级表现着历史的必然性。

由此可见，流氓无产阶级概念为澄清马克思的阶级观创造了契机。通过占据阶级关系与形势中的特定位置，原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从而具有偶然性的流氓无产阶级，又成了阶级关系之内的存在。正如学者指出，“阶级因此一定是关系概念”。^[19]如果说偶然性还只是抽象地否定了阶级划分的实体主义倾向，那么关系与形势的必然性则展现了阶级互动的关系主义图景。阶级分析不是意味着把一个社会分割成若干互不相容的实体，而是意味着将看似孤零零的东西纳入到这个社会的复杂关系整体中来理解。“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不应当被严格对待，它不过是我们在理解阶级概念时的一个中间步骤和环节，因而需要重新纳入到阶级关系中来定位。相较于“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更能表现出阶级关系的“非严格性”。人群与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预先确定或固定不变的，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脱节、错位、变换的可能。这种对应关系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共同规定，因而只能在特定的历史传统与斗争形势中来探究。阶级叙事意味着对各种异质性要素的综合，而不是社会的抽象分类。在这里，阶级概念与其说解释了具体的历史，不如说向我们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具体历史的要求和任务。它要求我们进入到历史之中，分析历史之中具体而特殊的结构、关系和位置。因此，阶级概念仅仅是正确的提问方式。

然而，流氓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绝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强调从结构和位置去解释历史事变，是为了反对从抽象主体或道德等偶然要素去看待问题；但这种必然性的关系整体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结论。历史从来不会止步于任何特定的必然性。关系主义的图景不仅意味着对特定阶段的异质性要素的综合，而且更意味着在历史时间中对这个阶段与一个异质的新阶段的综合，也就是说，意味着超越特定阶段的新的可能性。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需要在历史时间中来定位。

三、流氓无产阶级反衬历史的可完善性

虽然阶级关系与形势的必然性可以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波拿巴政变,但是认识论的思路不是完整解读马克思的恰当方式。如果一味强调流氓无产阶级活动所表现的必然性,那么这相当于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9](P500)}。实际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9](P500)}。马克思的终极目标是改造世界,他始终以新的可能性来思考历史。只有从这种活生生的伦理或实践态度出发,才能更加恰当把握马克思对波拿巴政变的阶级叙事。

从伦理或实践的思路来解读马克思,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历史可完善性的角度来把握流氓无产阶级。正如怀特所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既包含了一种共时性分析,也包含了一种历时性分析,前者针对的是一直保留在历史中的关系的基本结构;后者针对的则是超越这种结构并构成一种崭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形态的重大运动”^{[20](P389)}。马克思始终从有待生成的视角来看待既成的东西。在形势的必然性将流氓无产阶级推上历史舞台时,新的历史变革“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8](P226)}。特定的必然性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之所以要揭示这种必然性,是为了批判和超越它,以呈现历史的另外一个方面,即可完善性。这两个方面之间形成一定的反差。在这里,表现着特定必然性的流氓无产阶级也反衬着历史的可完善性。更为确切地说,流氓无产阶级不仅是历史可完善性的一个破坏者、一个反例,而且也同它保持着特定的联系。可完善性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伦理或实践意义上的关系。当人们以积极实践的态度去对待既成的现实时,流氓无产阶级的活动在这种伦理关系中得到新的定位。流氓无产阶级也正是凭借着在这种新型关系中占据着特定的位置,才能够发挥

反衬历史可完善性的作用。

直接来看,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实现了历史的逆退。正如索伯恩所认为,流氓无产阶级在历史的反常变化中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5]在法国,突如其来的二月革命向人们呈现了共和主义的前景。但随后的形势发展却大相径庭。首先是提出社会主义要求的无产阶级遭到了法国其他各阶级的联合绞杀,法国革命由此开启倒车。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试图按照共和主义的理想设计法国政治制度,但这一设想以秩序党强制解散共和派的制宪议会而告终。秩序党接着通过击败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山岳党而掌握政权,但这种胜利在波拿巴用武力解散秩序党的立法议会后不复存在。流氓无产阶级最终实现了对全社会的统治。在整个过程中,相对先进的势力被相对落后的势力打败,后者转而又被更加落后的势力打败。“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8](P156)}随着流氓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社会的统治权力落入这个从社会各阶级中淘汰出来、毫无政治建树和道德底线、阴谋复辟的人群手中,从而宣告了共和前景的彻底破产。从直接的角度来看,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完全是历史可完善性的反例。

然而,恰恰由于这种直接的逆退,作为事变主角的流氓无产阶级表演了一出能够揭示法国社会悖论性的历史喜剧。当各个阶级的人们都将自身利益寄托在共和主义的理想中时,流氓无产阶级的“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8](P223)}。一出荒唐滑稽的喜剧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堂而皇之地上演:流氓无产阶级拙劣地模仿过去、盲目地自我夸大,毫无底线地追逐私利、阴谋复辟帝制,并且取得了成功。这出既令人啼笑皆非又完全出乎意料的喜剧让共和主义方案以醒目、棘手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从而迫使人们反思使流氓无产阶级得以成功但又被共和主义方案所掩盖的残酷现实:经历了二月革命的法国依然处在大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阶级矛盾复杂等境况中。如果说共和主义起初代表着人们追求

各自阶级利益的努力和尝试，那么经由“刺刀一戳”，这种努力和尝试的悖论性也完全呈现了出来，即不触及社会根基的努力和尝试必然走向破产。在这里，流氓无产阶级不再被认为中断或破坏了历史的进程，而是被认为能够以荒唐滑稽的方式揭露和呈现法国社会进步与保守的悖论性。如果说在海斯分析流氓无产阶级的三种形式时^[6]，被视为难题的始终是流氓无产阶级本身，那么在这里，被视为难题的恰恰是那些使流氓无产阶级得以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在亲身经历这出历史喜剧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只有打破并超越流氓无产阶级以喜剧方式表现出来的特定必然性，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们自身的利益。“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8](P134)}由此，流氓无产阶级所表演的这出喜剧在客观上提出了改造法国社会的历史任务。

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不仅提出了历史难题，而且以否定的方式规定着解决难题的行动主体。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排除了大资产阶级、小农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完成历史任务的可能性。首先，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失败是由其阶级利益所规定的。在法国，大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8](P177)}。流氓无产阶级的掌权恰恰能够遮蔽大资产阶级对广大农民和工人的盘剥。大资产阶级在政治失利中完成了同流氓无产阶级的“合谋”。正是这种与现存秩序的一致性决定了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其次，小农阶级也无法完成变革法国社会的历史任务。法国的小农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他们在政治上必须依附于一个强大的“主宰”，“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8](P229)}虽然波拿巴政府一系列继续盘剥小农的政策会促使他们醒悟，但如果缺少与“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8](P232)}即革命无产阶级的联盟，这种醒悟充其量只能导致一个新的“波拿巴”政权的出现。小农阶级的生存方式和阶级特性戏剧性地决定着，他们同盘剥他们的大资产阶级一样支持国家对市民社会的

压制。最后，小资产阶级同样无法完成变革法国社会的任务。这个中间阶级的行动“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8](P162)}。但小资产阶级在参与镇压无产阶级起义时的坚决与强大、在反抗大资产阶级和波拿巴时的犹豫与软弱充分表明，他们既不能推翻现存秩序，又无法阻止现存秩序的进一步强化。在这个意义上，小资产阶级与其说是中间阶级，不如说是统治阶级的附庸。由此可见，流氓无产阶级在击败对手的过程中暴露出对手的真正软肋，即它们在实践中同法国现存秩序的一致性。通过这种排除的方式，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在客观上呼唤着新对手的到来。

最后，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还为化解难题创造着条件和形势。正如有学者指出，流氓无产阶级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思考革命主体性的机会。^[21]流氓无产阶级历史喜剧的观众不是某个现成的群体，而是一个正在生成的“阶级”。波拿巴政变的成功间接反映出无产阶级还有待成熟。无产阶级首先是资本主义秩序之内的存在——它既在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遭受剥削，又在一定限度内进行反抗和斗争。即使是二月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也“还陶醉于为它开辟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8](P138)}，也就是说，还沉浸在共和主义的政治设计中。然而，正是在置身于由流氓无产阶级所主演的历史喜剧中并遭受失败时，无产阶级逐渐走向成熟。这种以失败为结果的实际斗争在双重的意义上教育着无产阶级。一是它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摆脱现存秩序的努力和尝试。在反抗由流氓无产阶级所完成的历史逆退并遭受来自其他阶级的镇压或反叛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彰显和锤炼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勇气和决心。正是在这种押上实际赌注并付出巨大代价的斗争中，它才开始斩断同资本主义既定秩序的关联纽带。二是为无产阶级进一步成长提供契机。押上赌注的斗争使无产阶级进入实际抉择的情境，让它能够感受到自身同既定秩序之间残存的关联。一方面，六月起义的失败以最直

白的形式告诉无产阶级,它的阶级利益在现存秩序内是最不可能实现的;另一方面,在流氓无产阶级的胜利中,无产阶级恰恰能够进一步认识并逐渐克服它自身仍受既定秩序羁绊这一软肋。于是,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8](P135)}。正如齐泽克所言,无产阶级不是某个确定的人群,而是主体性位置 (subjective position)^[22];它本身是不断改造和超越现存秩序的产物。因此,用马克思早期的话来说,流氓无产阶级所演出的喜剧恰恰使无产阶级“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23](P204)}。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这出喜剧,法国社会正在“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8](P135)}。

综上所述,流氓无产阶级所反衬的历史可完善性至少具有从抽象到具体的三个层次。首先,既定的阶级关系始终同新的可能性处在有待建立的伦理关系中。既定阶级关系的必然性既不自足,也不连贯。当这种必然性通过在其中占据位置的偶然性表现出来时,它本身的悖论性也一并呈现出来。如果要消除这种悖论性,就必须将既定的阶级关系再纳入到新的伦理关系中,实现对既定阶级关系的实质性改造。其次,这种伦理关系的实现具有否定的规定性。对既定阶级关系的实质性改造无法由既定秩序之内的阶级来完成。这些阶级的斗争只能走向历史的同一。最后,这种伦理关系在一种特定的不确定性中得到落实。既定的阶级关系本身孕育着一个有待形成的“阶级”。作为本身要消除阶级关系的存在,无产阶级在同其他阶级的“阶级斗争”中逐渐割断同既定秩序的联系。正是在这个“阶级”的形成过程中,流氓无产阶级所反衬的历史可完善性逐渐得以实现。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与历史的构图最终落脚在变革世界的行动中。这表现出马克思关于历史进程整体性的理解。在他看来,历史的过去和将来在一种伦理或实践关系中被合成为一个新的整体。过去不是在物理意义上

的时间流中某个已经逝去的、独立自存的片段。如果借用海德格尔对“时间性”的理解,即“作为曾存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24](P444)},那么过去恰恰和将来一样是当下实践整体中的构成性环节。在这里,“时间性的首要现象是将来”^{[24](P449)}。只有在同将来的关联与交织之中,过去才能得到恰当的考虑和安排。虽然实际的历史发展可能会停滞乃至倒退,但这仅仅意味着,过去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赢得了将来不加批判的认同或默许。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单纯延续遮蔽了它同将来的关系。这种遮蔽从来不是单纯认识论意义上的错误,它意味着一种对待过去的保守态度。马克思的阶级叙事恰恰要发挥解蔽作用,同这种保守态度进行斗争。如果说在阶级关系的必然性问题上,阶级叙事要反对“严格”的阶级划分;那么在阶级关系的可完善性问题上,阶级叙事则要强调一种不确定的实践差别,即革命无产阶级与局限于既定阶级关系之内的诸阶级之间的差别。后一种差别恰恰是为了批判和超越前一种划分所掩盖的阶级互动关系。在这里,阶级叙事包含着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对实际形势的介入,从而具有伦理或实践的维度。它要求我们始终以积极实践的态度对待既成的阶级关系,以更加自觉的方式探寻它与将来的可能关联,并且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实践尝试中不断创造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COWLING M. Marx's lumpenproletariat and Murray's underclass: Concepts best abandoned? [M]// COWLING M, MARTIN J, eds. Marx's Eighteenth Brumaire: (Post)modern interpretations. London & Sterling, Virginia: Pluto, 2002: 228-242.
- [2]DRAPEY H.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2,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lasses [M]. Delhi: Aakar Books, 2011.
- [3]BARROW C W. The dangerous class: the concept of the lumpenproletariat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0.
- [4]夏莹,邢冰.论“流氓无产阶级”及其在当代哲学语境中的嬗变[J].探索与争鸣,2019 (2): 47-55.

- [5] THOBURN N. Difference in Marx: The lumpenproletariat and the proletarian unnamable[J]. *Economy and Society*, 2002, 31(3): 434-460.
- [6] HAYES P. Utopia and the lumpenproletariat: Marx's reasoning in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988, 50(3): 445-465.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BUSSARD R L. The "dangerous class" of Marx and Engels: The rise of the idea of the lumpenproletariat[J].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1987, 8(6): 675-692.
- [11]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12] 广松涉. 物象化论的构图[M]. 彭曦, 庄倩,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3] DRAPER H.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1, state and bureaucracy[M]. New York &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 [14]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先刚,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15] COMNINEL G C. Alienation and emancipation in the work of Karl Marx[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 [16] WATKINS G. The appeal of bonapartism[M]// COWLING M, MARTIN J, eds. Marx's Eighteenth Brumaire: (Post)modern interpretations. London & Sterling, Virginia: Pluto, 2002: 163-176.
- [17] MARTIN J. Performing politics: Class, ideology and discourse in Marx's eighteenth brumaire[M]// COWLING M, MARTIN J, eds. Marx's eighteenth brumaire: (Post)modern interpretations. London & Sterling, Virginia: Pluto, 2002: 129-142.
- [18] 阿尔都塞.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M]. 陈越, 编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 [19] 陈培永. 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当代理解[J]. 学术研究, 2018 (7): 10-17.
- [20] 怀特. 元史学: 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 陈新,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21] BOURDIN J C. Marx et le lumpenprolétariat[J]. *Actuel Marx*, 2013, 54(2): 39-55.
- [22] ŽIŽEK Slavoj.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J]. *Critical Inquiry*, 2006, 32(3): 551-574.
-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24]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责任编辑 邱佛梅】

The Lumpenproletariat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Configuration of History: On the Class Narrative in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XIONG Shiwei

Abstract: "Lumpenproletariat"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group-name in Marx's class narrative of Bonaparte's coup. Taking the lumpenproletariat as an entry point and examining its connection to history offers an opportunity to more fully and appropriately grasp Marx's class narrative. From a direct perspective, the lumpenproletariat itself constitutes a group outside the social structure, thus belonging to the contingency of history. This contingency not only exposes the limitations of treating class as a social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but also calls for further inquiry into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at enable this group to play an active role. The contingency non-reductively expresses the specific necessity of French class relations and conjuncture. This shows no fixe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opulations and classes. Meanwhile its actions expose paradoxes within the conjuncture, which draws the necessity into new practical configurations and highlights history's perfectibility. The lumpenproletariat thus becomes a crucial figure through which Marx articulates a triadic historical configuration—where contingency, necessity, and perfectibility are dialectically intertwined, forming the structural logic of his class narrative in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Keywords: lumpenproletariat; contingency; necessity; perfectibility; Marx; class narrative